

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相关问题试析

李永强 (洛阳大遗址保护办公室)

摘要: 洛水河床在隋唐洛阳城筑建前后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并非是筑城时将其改道, 使其贯都。隋唐大运河洛阳段最初主要是利用自然河流洛水, 漕渠开通后, 其漕运功能代替了洛水, 成为运河的一部分。储藏通过运河运来的租粮的含嘉仓, 其筑建年代在高宗、武则天时期。

关键词: 隋唐大运河; 洛水; 漕渠; 含嘉仓

中图分类号: K871.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11)04-0050-05

隋炀帝在位期间, 开凿了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流——隋唐大运河。隋唐大运河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组成, 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成为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唐代诗人皮日休把大运河的开凿同大禹治水相提并论。^[1] 由于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巨大, 2006 年两会期间, 58 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 建议从战略高度将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06 年 12 月, 国家文物局把中国大运河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在此背景下, 相关省市都在积极地进行大运河申遗的准备工作。在梳理洛阳境内有关大运河的资料时, 我们发现, 大运河申遗不仅要大量的准备工作, 而且有的问题还须进一步研究, 本文就与大运河有关的几个问题作一探讨, 敬请指正。

一、洛水改道问题

据北魏酈道元《水经·洛水注》记载: 洛水发源于上洛县(今陕西洛南县), 东北流, 经卢氏、洛宁、宜阳三县(在宜阳县有枝洩左出), 进入洛阳境内, 洛水和枝洩经三王陵南, 枝洩东北流入谷水, 洛水东北流, 过汉河南县南, 再向东过洛阳县南, 伊水在此处从西面汇入洛水, 又东过偃师县南, 再东北流, 过巩县东, 向北流入黄河。

《水经注》记载的这条洛水与现在流经隋唐洛阳城遗址的洛河是否是同一条河流? 20 世纪

90 年代, 方孝廉先生根据文献记载结合现在的地形情况, 对洛阳市以南东西近 100 公里、南北近 5 公里的范围进行了考古调查, 在六个地点进行了考古钻探。结合在关林皂角树遗址发掘所见古河道的情况和二里头等遗址以及古代墓葬的分布等情况, 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现在的洛河, 其走向与隋代所开通济渠的走向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今洛河就是古代的通济渠, 是人工开挖的运河, 而非天然河道; 隋代以前, 洛水的走向是由宜阳县进入洛阳市境内后, 经周山、三王陵南, 再经隋唐洛阳城南东去,^[2] 而非如《唐六典》所载: 隋唐洛阳城“前直伊阙之口, 北依邙山之塞, 东出瀍水之东, 西出涧水之西, 洛水贯都, 有河汉之象焉”。

起初, 笔者对方先生的观点也深以为然。随后, 我们在考古工作和查阅有关资料时, 发现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我们在发掘隋唐洛阳城外郭城正南门——定鼎门遗址时, 发现门址南北两侧的隋代道路下面均为厚约 50 厘米的黄土, 黄土十分纯净, 黄土下面为卵石和泥沙等河道堆积。在对南市遗址钻探时, 发现距今地表 3~4 米的堆积层下也有卵石堆积。随后, 我们走访了隋唐洛阳城遗址上的一些村庄。据介绍, 董庄、赵村和茹凹等村居民在打井挖坑时, 也都发现有卵石堆积, 卵石距地表深 1.5~4 米不等。这些现象说明: 今洛河以南, 在地下普遍存在着卵石堆积, 而不仅仅是在

隋唐洛阳城遗址南侧存在。因为，伊洛盆地本来就是由伊、洛河冲积而成。营建洛阳城前这里的地貌如何呢？据唐韦述《两京新记》记载：隋炀帝在营建洛阳城前考察地形时，站在北面的邙山上，南望伊阙，回头问到“此龙门耶？自古何为不建都于此？”从隋炀帝对拟建东都城的位置极为满意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邙山和龙门山之间，除了一条洛水之外，视力所及，当是一片沃野，而非成片的乱石。这些卵石应该早在隋代以前就已经存在，隋建洛阳城前，大多已被黄土覆盖。

方先生认为“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是唐代人的说法，在隋和唐初的文献中不见，因此，“则将存在洛水原不曾穿（隋唐洛阳）城东流的可能性”。

洛水贯都的说法，在唐初的文献中是有记载的。专记隋炀帝大业年间史事和传闻的《大业杂记》记载“东都大城，周回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西拒王城，东越瀍涧，南跨洛川，北逾谷水。宫城东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宫）城南、东、西各两重，北三重，南临洛水。”明确说明洛阳城是跨洛水而建的。

方先生认为“《大业杂记》虽专记大业年间的事物，但作者杜宝为唐人，生卒年代不详，恐不会比魏征等更早，所记也不会比魏征等更可信。”关于杜宝和他的《大业杂记》，辛德勇、霍宏伟等先生都曾著文加以考证，指出：杜宝在隋炀帝时期为学士宣德郎，唐贞观时期为秘书省著作局著作郎，撰写《大业杂记》的主要目的是补《隋书》之不足，成书年代应早于唐神龙元年（705 年），《大业杂记》对于研究隋代历史价值极高。^[3]

隋代薛道衡的《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中有“京洛重新年，复属月轮圆……万方皆集会，百戏尽来前。临衢车不绝，夹道阁相连。惊鸿出洛水，翔鹤下伊川”的诗句，诗中描写的是月圆之夜洛阳城内戏场的情况。另外，隋炀帝的《冬至乾阳殿受朝》中有“新邑建嵩岳，双阙临洛阳”的诗句，因为乾阳殿是隋洛阳城宫城中的宫殿，所以诗中的“双阙”当指宫城正门应天门（隋称则天门）外的东西两阙，诗中的“洛阳”即洛水之阳。从隋代的诗文中不难看出，当时即称洛河为洛水。

在聂湾村西、今洛河东岸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一条汉代的道路，道路西侧呈坡状下斜，根据地形分析，这条道路应该是沿洛河东岸的一条滨河路，也就是说，最迟在汉代，洛水已改道至今洛河的位置。改道后，有可能仍有部分水流从后建的隋唐洛阳城的南面东流，隋代对其进行疏导整治而成甘泉渠。^[4]

因此，我们认为《大业杂记》的记载是可信的，隋在营建洛阳城之前，洛水的位置与今洛河基本一致，隋唐洛阳城是跨洛水而建的。文献关于漕渠开凿的原因，也印证了这一点（详见下文）。

段鹏琦先生指出“从现状看，在洛阳附近，洛河流向仍与《水经注》记载基本相符，唯自汉魏洛阳城西南至偃师县南的今洛河道较故道北移。据实地调查，汉魏时期的这段洛河河道，在今偃师县佃庄和东大郊村南、西大郊和翟镇村北的东西一线，北距汉魏洛阳南垣近 2 公里。”^[5]

汉魏洛阳故城附近的这段洛河是何时改道的？我们认为，这与漕渠的开凿有关，改道后的这段洛河是隋唐大运河的一部分。

二、通济渠与漕渠和洛水的关系问题

关于通济渠，《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元年三月“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大业杂记》则曰：大业元年，“发河南道诸州郡兵夫五十余万，开通津渠，自河起荥泽入淮千里余；又发淮南诸州郡兵夫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渎至于扬子。入江三百余里，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通济渠渠首到底是从“自西苑引谷、洛水”开始，还是从“自河起荥泽”开始？我们认为，《大业杂记》之所以把通济渠渠首放在“自河起荥泽”，是因为从黄河到淮河这一段全部是人工开凿的河道，比较规整，而“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这一段，主要是利用自然河道，不可能整齐划一。

苏健先生认为：通济渠上段“起自东都洛阳以西的西苑，引谷水（涧河）、洛水（洛河）贯洛阳城，即在洛水北岸开一条漕渠，东出循周、汉时开凿的阳渠故道，然后至偃师与鸿池相汇，入于洛水”，洛水与通济渠是两回事。^[6]实际情况如何呢？

元《河南志·唐城阙古迹》记载“漕渠本

本不具通航能力后,加上洛阳城的废弃,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二者经过摆动,逐渐合二为一,是很难分清楚的。汉魏故城以南至偃师商城遗址南面的洛水故道,之所以能够区别开,是因为漕渠开凿后,洛水的这一段逐渐断流而干涸。

运河所运货物当以粮食为主,隋唐洛阳城内有含嘉仓城,《大业杂记》只说“通大船入通远市”,而不提含嘉仓,这是什么原因?我们认为,这是因为隋代还没有含嘉仓,含嘉仓的建造应该是在唐代。

三、含嘉仓的年代问题

关于含嘉仓的筑建年代,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建于大业元年,即与隋唐城同时修建;^[8]另一种观点认为建于唐初。^[9]我们认为,含嘉城与含嘉仓城是两个概念,虽然两者的位置和规模都相同,但含嘉城内无官仓,含嘉仓城内却是官仓密布。含嘉城的修建要早于含嘉仓。

含嘉城筑建于何时,文献无明确记载。据元《河南志·隋城阙古迹》记载:隋唐城的东城筑建于大业九年。而含嘉仓城的东西二垣与东城的东西二垣分别在同一条直线上,两城中间为一隔墙,因此,我们认为,含嘉城极有可能与东城同时筑建,即大业九年,而非与隋东京城同时修建。

《大业杂记》记载“东城门东街,北行三里有含嘉门。门北即含嘉城,城北德猷门。出含嘉城西,有圆壁门。”对于含嘉城的记载十分简略,没有记载城内有仓窖,该书却有“(右掖门街)街西有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子罗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别受八千石”的记载,若含嘉城内有大批粮仓,书中也应有所描述。

成书于唐初的《隋书》,也只提含嘉城而不提含嘉仓。《隋书·列传第三十六》记载:元文都欲除王世充,“事临发,有人以告充。充时在朝堂,惧而驰还含嘉城,谋作乱”。《隋书·列传第五十》记载“李密与战,充败绩,赴水溺死者万余人。时天寒大雪,兵士既渡水,衣皆沾湿,在道冻死者又数万人,比至河阳,才以千数。充自系狱请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还都。收合亡散,复得万余人,屯于含嘉城中,不敢复出。”《隋书·食货志》记载“始建东都……新置兴洛及回洛仓”,没有提到含嘉仓。

记载“含嘉仓”较早的文献是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唐六典》。《唐六典》卷三记载:“凡都之东租纳于都之含嘉仓,自含嘉仓转运以实京之太仓。自洛至陕运于陆、自陕至京运于水,量其递运节制,置使以监统之。”该书卷一九记载“皇朝置太仓令三人,东都则曰含嘉仓。”

成书于五代及稍后的文献,如后晋时的《旧唐书》、北宋时的《唐会要》和《新唐书》等均有含嘉仓的记载。《旧唐书·德宗本纪》记载:“(贞元十四年十二月)癸酉,出东都含嘉仓粟七万石,开场赈以惠河南饥民。”《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凡都已东租纳含嘉仓,自含嘉转运以实京太仓。自洛至陕为陆运,自陕至京为水运,置使,以监充之。”《旧唐书》记载隋末王世充与李密交战事,则为“世充引军渡洛水,与李密战,世充军败绩,溺死者万余人,乃率余众归河阳。时天寒大雪,兵士在道冻死者又数万人,比至河阳,才以千数。世充自系狱请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征还洛阳,置营于含嘉仓城,收合亡散,复得万余人”,把《隋书》中的“含嘉城”改作了“含嘉仓城”,这是用撰写《旧唐书》时的名称叙述前朝故事。

在含嘉仓城内没有发现隋代刻铭砖,应该不是工作做的少的原因,而是隋时含嘉城内根本就没有粮仓。《贞观政要·奢纵》记载“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资治通鉴》卷一八五记载“东都乏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不食公粮者进散官二品;于是商贾执象而朝者,不可胜数……李密将入朝,至温,闻元文都等死,乃还金墉。东都大饥,私钱滥恶,太半杂以锡镞,其细如线,米斛直钱八九万。”《资治通鉴》卷一八六记载“王世充既专大权,厚赏将士,缮治器械,亦阴谋取密。时隋军乏食,而密军少衣。世充请交易,密难之;长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劝密许之。先是,东都人归密者,日以百数;既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这些记载说明,当时的含嘉城内是不可能有大量存粮的,而大批仓窖的存在也就不可能了。

含嘉仓城内开始作为大型官仓的时间应与新潭开挖的时间接近,当在高宗、武则天时期。在

含嘉仓 182 号窖内出土的 2 号铭砖上有调露年号,^[10] 114 号窖内出土的 1 号铭砖上有永淳元年十月纪年,^[11] 由此可以推测,含嘉仓的始建年代是唐高宗时期,因为,高祖、太宗两朝,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建设含嘉仓的可能性不大。

隋含嘉城内无粮仓(即使有,数量也极有限),那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呢?从“(王世)充时在朝堂,惧而驰还含嘉城”和“(王世充)收合亡散,复得万余人,屯于含嘉城中”等记载来看,我们认为,含嘉城在作为仓城之前有可能是用来驻军的。

含嘉仓修建之前,大运河漕运至洛阳的货物,粮食入兴洛仓和回洛仓等,其余货物供给市场,主要是北市,因此,当时的北市十分繁荣。含嘉仓修建之后,通过运河运来的粮食如何进入含嘉仓呢?

四、租粮入仓问题

元《河南志·唐城阙古迹》记载:“(漕渠)东北流,至立德坊之南,西溢为新潭。长安中司农卿宗晋卿开。”关于新潭的开营时间,《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大足元年六月,于东都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诸州租船。”《唐会要》卷三记载“大足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改为长安”,因此,二者出入不大。“以通诸州租船。四面植柳,中有租场,积石其下,于上布土。潭立石柱,马吉甫为其文,钟绍京书。后潭中水浅,租船不能至……立德坊北街有泄城坊(渠),自含嘉仓城出,循城南流,至宣仁门南曲而东流,经此坊之北,至东北隅,绕此坊屈而南流入漕渠”。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勘探出隋唐洛阳城东城东墙外侧有一条南北向水渠,宽约 25、深约 10 米。该渠从含嘉仓城流来,沿含嘉仓城东墙而下,经东城东墙外侧南流至宣仁门前,略向东弯折,向东南流入位于洛河北里坊区的新潭内。这与文献记载的泄城渠是吻合的。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新潭是运河漕运到含嘉仓城的中转码头,租船到新潭后,要将租粮全部卸下,置于租场之上,再由官船沿泄城渠运至含嘉仓内。因此,新潭左近“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而泄城渠是大运河(漕渠)至含嘉仓城之间的重要粮运

通道。^[12]《大业杂记》记载:通济渠宽 40 步。《元和郡县图志》的《贝州》“永济县”条下记载“永济渠,在县西郭内。阔一百七十尺,深二丈四尺。”《资治通鉴·隋纪》记载:“(大业六年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最窄的江南河的宽度也在 30 余米以上,泄城渠 25 米的宽度是否具备航运条件呢?1999 年,在安徽淮北市濉溪县的柳孜发现了大运河内的唐代沉船,经复原,一号唐船的船体总长为 18.97、总宽为 2.58 米,经计算,船舶的满载排水量为 13.69 吨,估计该船的载重量可达 8~10 吨。^[13]从该船的复原尺寸看,泄城渠内通行比该船宽一倍的船只绝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因为新潭和漕渠上常常舳舻万计,一旦发生水灾,这些船只就首当其冲。《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开元十四年七月十四日,漕水暴涨,流入洛漕,漂没诸州租船数百艘,溺死者甚众。漂失扬、寿、光、和、卢、杭、瀛、棣租米一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六石,并钱绢杂物等。因开斗门决堰,引水南入洛,漕水燥竭,以搜漕官物,十收四五焉。……开元十八年六月乙丑,东都漕水暴涨,漂损扬、楚、淄、德等州租船。”漂失的租米应该是要入储含嘉仓的。从“开斗门决堰,引水南入洛”一句可以看出:斗门是可以自由开关的,而洛水中所筑之堰是固定的。这与元《河南志》关于隋开漕渠的记载是吻合的。

大运河这一线性文化遗产与其他线性遗产有着显著区别,大运河是由运河和自然河流共同组成的一个水运网,而非单纯的一条线。因此,要想保护好运河遗产,就要对与运河有关的水利工程、航运设施、管理机构、沿线城镇和村落、自然河流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本文所述,只是就个别问题略陈己见。洛阳段大运河的考古和研究以及保护工作均有待进一步深入。

注释:

[1] 皮日休《汴河怀古》:“尽管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2] 方孝廉《隋开通济渠与洛河改道》,《考古》1999 年第 1 期。

(下转第 67 页)

[11] 周绍良、赵超 《唐代墓志铭汇编续集》，第 108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2] 同 [4]，第 7868 页。

[13] 《旧唐书》卷一六三《杜元颖传》，第 4264 页。

[14] (唐) 卢求 《成都记序》，《全唐文》卷七四四，第 7703 页，中华书局，1983 年。

[15] 同 [4]，第 7868 页。

[16] 同 [4]，第 7868 页。

[17] 同 [14]。

[18] (唐) 孙樵 《书田将军边事》，《全唐文》卷七九五，8335 页。

[19] 《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下》，第 548 页。

[20] (唐) 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 《李德裕文集校笺》，第 208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21] 《旧唐书》卷三八，第 1389 页。

[22] (唐)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 《唐六典》，第 157

页，中华书局，1992 年。

[23] (唐) 杜佑 《通典》，第 767 页，中华书局，1988 年。

[24] 《新唐书》卷一八〇，第 5332 页。

[25] (元) 马端临 《文献通考》卷二〇五《经籍考》，中华书局，1986 年。

[26] (唐) 李林甫等 《唐六典》，第 743 页。

[27] (唐) 杜佑 《通典》，第 767 页。

[28] (唐) 孙樵 《书田将军边事》，《全唐文》卷七九五，第 8335 页。

[29]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纪》，第 8078 页。

[30] (明) 曹学佺撰，刘知渐校点 《蜀中名胜记》卷一《川西道·成都府一》，第 7 页，重庆出版社，1984 年。

[31] 王明校释 《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一三，第 241 页，中华书局，1986 年。

[32] (清) 董浩等 《全唐文》卷一九三，第 1949 页。

[33] (清) 董浩等 《全唐文》卷一五〇，第 1532 页。

(上接第 54 页)

[3] a. 辛德勇 《〈大业杂记〉辑校》，三秦出版社，2006 年；b. 霍宏伟 《〈大业杂记〉与隋唐洛阳城》，《中国地方志》2006 年第 12 期。

[4] 《大业杂记》记载：定鼎门和长夏门南二里有甘泉渠，疏洛入伊渠。

[5] 段鹏琦 《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和利用》，《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

[6] 苏健 《洛阳与大运河》，《河洛春秋》2007 年第 3 期。

[7] 方孝廉 《隋通济渠与东都洛阳城布局》，《华夏考古》2009 年第 3 期。

[8] a. 洛阳博物馆 《隋唐洛阳含嘉仓城德猷门遗址的发掘》，《中原文物》1981 年第 2 期；b. 河南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 《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 年第 3 期。

[9] 余扶危、贺官保 《隋唐东都含嘉仓》，文物出版社，

1982 年。该书几处提到含嘉仓的年代问题，说法不尽相同，甚或有矛盾者，如“含嘉仓，是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用以储藏粮食的大型国家粮仓之一”；“隋炀帝将国都迁到洛阳后，就在洛阳附近又增筑了洛口仓和回洛仓；更在东都城内营筑了两处大型粮仓，一为子罗仓，二为含嘉仓”；“如果（隋代）含嘉城内有储粮的情况，可能也仅仅是储存从洛口、回洛等仓转运来的，以供东都食用的部分口粮，规模可能很小，而不是像唐代含嘉仓那样是储藏东都以东的大量租米”；“含嘉仓真正成为国家的大型粮仓，是从唐初开始的”。

[10] 同 [8] b。

[11]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内部资料。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北宋西京洛阳监护城壕的发掘》，《考古》2004 年第 1 期。

[13] 阚绪杭等 《隋唐运河柳孜唐船及其拖舵的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4 期。